

“研究修辞”视角下的批评话语分析

涂家金

(福建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研究修辞”认为,知识生产和学术也是修辞和话语实践,因而必然受制于历史情境因素,充满说服和权力运作。从“研究修辞”的视角,将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态,即关于语言、话语及社会的学术话语或修辞实践,以批评话语分析所倡导的批评精神对其进行修辞分析和学术反思,解析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成功崛起的话语运作机制。研究揭示,批评话语分析不仅与修辞有着共同的理论旨趣,其学术话语实践也充盈着修辞运作,其在学术上的成功是运用符合学术场域话语逻辑的修辞发明策略的结果,因而也体现了修辞转向。这也证明了修辞与论辩在学术创造、知识生产和思想传播中的合法性和不可或缺性。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 “研究修辞”; 论辩; 学术话语; 修辞发明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5)03-0149-06

DOI:10.13764/j.cnki.ncds.2015.03.023

一 引言

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批评语言学的批评话语分析以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当代语言学理论和后现代哲学、社会学思想为基础,强调跨学科性和开放性^{[1][P225]} [2][P2-3,7-8],研究范围涉及新闻话语、种族话语、身份建构等诸多领域^{[3][P26]}。经过多年的发展,批评话语分析不仅在各个学历层次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具有自己的学术出版阵地,而且广为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吸收、借鉴^{[3][P24]} [4][P1],因而俨然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并大有超越“非批评”取向的所谓“主流语言学”而成为新的语言研究范式之势。近年来,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探讨批评话语分析。国内学者已注意到其所体现的批评转向并对其展开理论探讨或将其方法运用于各种话语的批评,但却尚未充分认识到其自身的修辞性和修辞转向,进而从西方修辞的角度,将“批评话语分析”这一学术话语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修辞实践进行解析。批评话语分析著述中对其与修辞这一源远流长、以话语说服和认同为关注的言说实践和理论范式之间的联系方面着墨不多。批评话语分析虽然一贯强调自身的反思性,但却未能直

接指涉自身的修辞运作,其极为简略的有关修辞的表述甚而在相当程度上模糊、遮蔽了其自身的修辞性。本文将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态,即关于语言、话语及其社会功能的学术话语和“研究修辞”实践,对其进行修辞分析,探讨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成功崛起的话语策略运作。对“批评话语分析”这一学术机构修辞者的话语实践进行解析不仅是批评的应有之义,而且是促进学术对话和知识生产的需要。

二 话语、权力与修辞

修辞对言说力量和各种生活话语的关注始终贯穿于其发展历程。Isocrates指出“没有哪一个机构或制度不是藉借言说的力量而建立……任何需要动用智力完成的事情无一不是藉借言说而发生。”^{[5][P69]}修辞学家们认为,话语是“权力的多种关系在社会的所有层面,在不同的机构、组群、个体之间和内部运作的策略维度”^{[6][P98]},是“控制的修辞”^{[7][P6]}。Burke的“辞屏”(terministic screen)和McGee的“意符”(ideograph)概念都认为语词是“意识形态的基本构件”^{[7][P7]}而充盈着话语动机,都强调通过语词或其他符号的“选择”(selection),“反

收稿日期:2014-12-25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项目“论辩修辞理论与中国话语实践研究”(201309360003)。

作者简介:涂家金(1973-),男,福建闽清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西方修辞学研究。

映”(reflection)某一事实或现象的某一方面的同时也“折射”(deflection)或不反映其他方面。我们对世界的许多体察感知其实“只不过是这些体察所赖以施行的术语的蕴涵而已”^{[8] [P45-46]}。修辞者或话语作者总是通过符号的选择限制受众的话语体验,将其导向符合自己意图的由辞屏或意符彰显的特定事实呈现,现实因此必然是话语的。

话语对现实的必然干预实质上是修辞者“有意识的话语施为”。这意味着话语可视为权力的介质,权力通过话语行为得以生产、再生产。同时,“权力是作为修辞的权力”,是“控制、影响或塑造修辞者周遭世界的说服努力”^{[5] [P65-68]};修辞就是如何通过话语实现权力表达。这也意味着“修辞是权力的技术,是生产性手段”;“权力总是存在于修辞行动之中”,“修辞行动施为权力,重新商谈权力的分布”^{[5] [P82]}。修辞批评因此可以用于分析、理解权力如何通过相关言说得以实现或受到挑战。现实、话语、权力与修辞的内在联系也提醒我们,貌似纯然中性的真理与知识生产很可能也难免掺杂权力因子和话语运作。诸如经济、社会地位等外在或先在因素都会影响主体间性过程参与者的言说语力,成为权力因素干预“事实/真理”的认定或建构^{[5] [P67-68]}。知识生产因而也是一种话语形态,而修辞、权力总是不可避免地掺杂于“知识”这种特殊话语的生产过程。对某一知识生产话语进行解析可还原其中的权力因子和修辞运作,进而揭示学术生发的规律。修辞、话语权力与知识生产的紧密勾连在修辞转向和“研究修辞”的兴起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的观念基础。

三 学术话语与“研究修辞”

修辞在科学研究、新闻等话语中常常被认为只是假、大、空甚而骗人的言辞把戏。这种对修辞的偏见使修辞与以生产知识和促进社会进步为己任的学术无涉乃至对立。学者们通常否认自己学术创作的修辞性。自17世纪西方科学主义范式逐渐确立以来,科学甚至诗歌都被看成是一种个体的、中性的事业。人们所做的似乎只需“报告”自己的观察和发现,而忘记了研究的社会与话语属性。于是便出现了诸如客观/主观、真理(理性)/修辞(对话)这样以前者为优的对立。修辞被排挤出了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的视界^{[9] [P3-6] [10] [P140]}。对知识或真理的追求成为现代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专利。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图尔敏、罗蒂等不断揭示

了真理与知识生产的修辞维度^{[10] [P141]}。修辞学家Perelman发现,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也总是通过诉诸不同的论辩策略来赢取人们对其观点的信奉,其所宣称的真理或知识也不过是诉诸普世受众的意见而已^{[11] [P7-31]}。这意味着真理与知识都仍然受到时空的限制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或然和修辞属性。80年代以来,修辞意识的扩散和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对修辞的兴趣,促成了继语言转向之后的修辞转向的形成。学者们已认识到“优秀的学术研究远不只是硬事实和冰冷的逻辑,而且,所谓的事实或逻辑如果不是符号(也即社会)建构的话,也(必然)是符号干预(的结果)”^{[12] [P2]}。修辞因而并非与学术话语对立,而是内在于学术话语的生成与运作之中。在西方学界,对学术话语的解析或批评已然在修辞转向的大潮中汇集成为一支“研究修辞”(rhetoric of inquiry)的新支流^{[9] [P3] [12] [P5]}。

强调学术的修辞性并非否认识、科学之于社会进步的意义,而是强调真理和知识生产无法脱离人和社会而获得意义。各种学术话语必然需要充满模糊性的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介质,必然面向特定的受众,并以影响并获得他们对相关观点的认同为目标,因而不可避免地充斥着人的主观性以及言辞运作,比如诉诸各种权威、隐喻乃至特定的情感唤起^{[9] [P4]}。各种表述以科学和真理的面目呈现其实往往也是一种说服手段。它不过是诉诸人们在混乱的经验世界里强烈的秩序欲求这一心理需要^{[13] [P18]}。与其他言说一样,学术话语也具有论辩维度,必然在特定的论辩语境中展开。某一理论观点的提出必定包含或隐或显的针对其他观点的回应和辩驳。比如,Lakoff等的体验认知语言观就可视为对乔姆斯基语言天赋论的话语回应。又如,西方高校中通常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沉淀着知识与真理的教科书中的相关表述其实也只是经过长期辩论而暂时获得知识地位,其所享有的权威地位在进入教科书之时也立即成为“所在学科前沿学术研究的靶标”并在批判与反驳中推动学科的发展^{[14] [P96]}。批评话语分析的崛起也不例外。“研究修辞”因而是致力于探究学术对话或学术话语本身的话语机制,最终促进学术对话和改善其质量。

四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修辞实践

1. 批评话语分析与修辞的联系

如前所述,修辞传统早已认识到话语具有显著的政治和实际效果。Van Dijk指出,古修辞学家如

Aristotle、Cicero 和 Quintilian 等是最早的话语分析家^{[15] [P727]}。Wodak 也强调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源头之一是古典修辞思想^{[2] [P3]}。修辞与话语批评的联系在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们看来更多地存在于逝去的传统之中。Tracy 认为“西方古典修辞思想是当今言语交际研究的智识起点,因而将其当成现在的话语分析的源头不成问题。”但她却又认为这“极易产生混乱”。毕竟“那些以修辞理论家和批评家自居的学者绝少同时以话语分析家自居。虽然修辞批评家与话语分析家都致力于解析具体语境中的文本,但二者对此旨趣的理解和追求的智识背景却迥然不同”。她强调,修辞批评属于人文学科,因而“与文学批评、政治和欧洲大陆哲学、历史、电影研究等相关联。而话语分析是典型的社会科学,因而与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教育学等紧密相关。而且修辞批评常以演说和独特的政治行动为关注,而话语分析通常关注那些寻常无异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Tracy 承认(现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比 1980 年代后期更加模糊,但她却坚持认为二者仍扮演分划学术群体或学科归属的作用^{[15] [P727]}。修辞因此除了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远古宗亲之外,与后者并无什么交联。Tracy 关于修辞批评的不合实际的评说(如修辞批评著作广泛关注各种日常话语)和她对修辞批评与话语分析的区分,以及其他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仅仅对古典修辞渊源蜻蜓点水式的提及,极易撇清批评话语分析与修辞之间更多的勾连,模糊前者对后者可能的紧密倚赖,在很大程度上斩断人们对批评话语分析本身可能所具有的修辞性的联想,让人因此忽视其作为一种学术话语形态本身的修辞运作。

2. “批评”的修辞发明与论辩内涵

修辞发明是为达致特定目的而寻求可说、能说的话语实践,是根据特定的修辞情境对旧观点、旧概念和旧旨趣等提出质疑、批判,继而挖掘、确立新话题和新观点的论辩过程。西方学术的标准修辞发明手段“是提出一个与其他人的观点对立的看法,然后证明前者是错误的”^{[14] [P84]}。法国当代思想家 Bourdieu 也指出,学术论辩中某一学术观点总是力图将自身的逻辑规定为学科场域中居统领地位的合法逻辑并占据支配地位,并将对手的观点归为非主流甚而不合法^{[16] [P207]}。

批评话语分析以“批评”冠名暗含对其他对社会不公和权力压制持非批判立场的学术范式、理论或学科的批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家们倾向于将传

统的语言学和会话分析归为“非批评性”的研究,因为后者的理论视角似乎忽视了语言与权力的关系。Fairclough 指出“批评方法与非批评方法的不同在于前者不仅只描述话语实践,而且还表明话语是如何由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所形塑。”^{[1] [P12]}传统的语言学者通常“专注于语法细节而未将特定语法结构置于意识形态实践和权力关系维系中”加以研究。他们只是专注于语言的静态、内在的纯技术层面,而未能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政治社会情境中加以考察。Schegloff 认为,会话分析的优势恰恰在于拒绝以政治化的范畴来研究会话互动。在他看来,这种“政治加强”将会阻碍对于会话细节的分析。但对于批评话语分析学者而言,这种将政治议题让位于纯粹技术层面的语言分析的做法显然过于狭隘^{[17] [P39]}。与修辞学家一样,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也认为,话语是权力的介质,通过分析文本可以揭示、理解权力的运作。批评话语分析倡导者们不再将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当成身外之事,而是将批评分析本身当成批判社会秩序直至促进社会变革的工具,而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纯粹技术层面的批判方法^{[17] [P38]}。批评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种能引发社会效果的政治行动。社会批评不是可有可无的分析产物,而是分析存在的理由。政治批评因而是内在于其分析的理论工具和方法之中。

批评研究路径还认为学术作品也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条件相关联,也是一种话语权力形态。非批评的传统语言学在地位确立的时间上、在学术受众数量上都堪称“主流”,因而享有优势地位,属于学术场域中的“既得利益者”。传统或主流语言学并没有将其研究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之内加以考察,并经常抨击批评话语分析为“政治上有偏见”或方法上“不够严谨”,因而“拒斥系统的社会批评”。这种做法在批评话语分析学者看来并非只是出于纯粹的学术互动,而是具有意识形态意味,是一种稳固或捍卫既有学术权势和学术体系的话语策略^{[17] [P39]}。“批评”因而在学术互动中实质上成为修辞发明话题(topos) 和论辩策略: 通过将其标示为语言分析的核心概念和意义所在,传统的静态的话语分析被阐释为具有某种重要缺陷因而需要加以批判或修正的研究理路。换言之,“批评”字眼的使用是一种以不以社会批评为导向的主流语言学为论辩对象的修辞发明策略。

质疑、挑战传统或主流研究范式必然动摇其观念基础而“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并迫使对该范式

确无疑的学者注意、重视新观点且产生与新观点“进行修辞接触的强烈动机”。同时,这一质疑也使批评话语分析学者承担起证明这些范式实际上存在重大缺陷、“批评”优于“非批评”的举证责任。在学术话语实践中,举证责任并非通常所认为的负担越少越好,而是“意味着就涉及的议题发表一通言论的正当理由,或者说它意味着有关语境对修辞者进行修辞发明的授权”^{[14] (P87-88)},也即让批评话语分析的提出师出有名。因此,“批评”也就成为其标示独特学术身份进而成功进入学术场域的修辞策略。另外,批评-非批评的对立并置意在提醒受众主流语言学的“霸权”,强调其非批评性研究本身也是一种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属性因而也需加以批评的权力话语形态。批评话语分析通过暗示、质疑主流语言学的动机,意图削弱其声望,破坏其学术形象,进而动摇其“主流”地位。批评-非批评的二元对立因而体现了典型的西方学术修辞发明路径。

3. 缩略语“CDA”的修辞与说服意味

Fairclough 指出,消费话语已经广泛渗透到各种话语领域,而非只体现于典型的市场话语之中^{[18] (P203)}。例如,学术场域就同样浸透着消费话语的因子。这具体体现为学术话语中学术产品的推销,即学者或学术机构如何通过话语策略来吸引学术受众消费其产品。学术消费话语也运用诸如“贬低竞争性的学术产品”,“彰显自己的理论卖点”,最终吸引学术顾客(如研究生、赞助商、可能的合作者)这样的市场化策略。策略之一就是“运用商标”,也即学者将其理论范式或著述进行包装,并以缩略语或简写形式作为其学术产品的标签^{[17] (P41)}。置身于学术场之中的批评话语分析的崛起也遵循类似的话语路径。

Billig 认为“学术推销由来已久,并不算什么不名誉之事。”然而,过去 20 多年来,这种“学术商标化”策略运用尤甚^{[17] (P41-42)}。批评话语分析亦不例外。他指出,批评话语分析知名学者 Fairclough 1992 年的著作《话语与社会变迁》并未使用“CDA”,而只是笼统地称批评语言学、意识形态批评等话语分析方法为“批判方法”(critical approaches)。其同年出版的《批评语言意识》使用了“批评话语分析”,但也仍未以“CDA”为标签。这一标签的使用是在 1995 年他的《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一书中,其副标题“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中的定冠词和“CDA”的使用标志着此前他提到的多种批判分析方法已然归一为一个统一的带着显著标

识的批判研究方法或范式^{[2] (P1-2) [17] (P35)}。Billig 因而指出,过往的那些对压制性的语言和权力进行剖析的理论方法、范式现如今全都汇集到了一个独特的学术工程“CDA”的名下。语言研究的批判视角也就成为一种商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批评话语分析与传统的、非批评性的语言研究实际上是同置于经济场域之中,采取了相同的市场化策略。这一策略给 CDA 带来的不仅是学术上的成功,也包括商业上的胜利,如相关学术刊物、书籍等出版量的上升和市场份额的扩大,更多的经济收益等。而这种市场话语上的成功又反过来巩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学术地位。这也说明“理论观点本身是不够的,只有商标化并成为易识别的知识产品才能成功地得以推销。”^{[17] (P41-42)}“CDA”这一缩略语的广泛使用表明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们也采用了标签式“学术营销”策略。该策略的修辞机制在于通过类似于名物化的“封装”(encapsulation),使其客观化为不可协商、不可改变的事物或客观存在,进而消抹掉人为创造、干预的痕迹。这样,名物化的缩略语本身又可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主位”、主体或起点,参与更为广阔的话语建构之中并更易于获得更广泛的传播。

4. 以学术促变革与修辞人格投射

修辞人格或威信(ethos)是修辞者(个人或机构)由于品德、能力、声誉等而获得的修辞语力。人格威信在说服三手段(另外两个指诉诸情感、诉诸道理)中是最具效力的^{[19] (P39)}。与“批评”相称,批评话语分析最为人称道之处在于其社会批评事业与社会变革之目标,即通过话语分析,批判当下的西方社会秩序,揭示西方权力精英所支撑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例如,Fairclough 解构了“标准英语”所隐含的不平等权力关系^{[18] (P55-58)}。他还从压制性权力关系入手来分析妇科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医患关系中所体现的“语篇后权力”^{[18] (P58-60)}。通过宣扬自己的学术志向和学术实践,批评话语分析投射出社会正义捍卫者的机构修辞形象。显然,批评话语分析提出的社会变革目标本身其实是诉诸修辞威信,即为该范式本身构筑、投射一个能够引发公众共鸣、拥戴的合适的修辞形象,尤其是促进社会变革本身可以认为是当代西方社会这一广义社群或文化内广为拥戴因而也难以反对的“普世价值”。诉诸这种普世价值的修辞好处在于让其反对者不好甚至不敢提出质疑异议,以免陷于自外于“主流”智识或意见而被边缘化或被鞭挞的尴尬境地^{[11] (P33)}。事实也确实如此。虽然学者们对仅仅通过话语批评来促进社

会变革这一伟大事业能否实现还心存疑虑,虽然语言学界对批评话语分析是否能像其宣称的那样可以带来真正意义的社会变革或具有真正的社会效果还颇有争议,但即便是对其持激烈批评态度的 Widdowson 也承认,揭示语言如何用于欺骗、歪曲和制造偏见在当代社会显得尤其迫切、尤其重要^{[20] [Pviii]}。Blommaert 也指出,批评话语分析“正确地将机构话语环境作为中心研究对象来考察语言、权力与社会过程的关系”,因此,“我们很难不同意批评话语分析的基本范式准则”和否认批评语言意识的重要性^{[3] [P33-34]}。可见,将自己的学术范式与促进社会变革绑定,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批评话语分析投射出了一个充满正义因而得到整个社群、文化授权的修辞形象。毕竟,在民主、公平作为崇高智力形象的当代西方,没有什么比以“批评”“促进社会变革”更能体现“公心”、更能扫除对其逐利的怀疑。批评话语分析的学术崛起因而与成功的修辞人格投射不无关系。

5. 化不定为预设与修辞急缺建构

批评话语分析通过话语批评揭示不平等权力压制实质上是将读者或大众预设为无权无助因而需要话语“帮助”的对象。实际上,按照 Hall 的观点,读者可能持有的阅读立场有三种,即压制式(dominant-hegemonic)(阅读立场与原文本所自然化的立场一致)、商谈式(negotiated)(只采纳原文本所传递的意义的一部分,并依特定意图对其进行“改造”)和反抗式(oppositional)(阅读立场通常与特定文化中的非主流阅读立场相联系)^{[21] [P136-138]}。这三种阅读方式说明在修辞情境中作为阐释者的读者是有多种可能的选择。从 Hall 的理论来看,批评话语分析显然先入为主地预设了受众只会以被动顺从的方式来阅读。Perelman 早已指出,受众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而非只能被随意摆布的物。真实的受众是能够自主选择因而需要“赢取”而非可以被任意摆布的行动主体^{[11] [P24]}。而批评话语分析则预设了受众(如各种媒体受众)在各类话语消费上的无权无势,将其理所当然地当成需要通过话语批评解析来唤醒的权力牺牲品和解救对象,将其在话语互动中可能的自主性和能力这一多元前提简化为顺从乃至被动接受。Widdowson 因而将批评话语分析对读者自主性的忽视归结为有意而为的“谋划”(pre-text)^{[20] [P107]}。那么,这种受众简化究竟有何修辞意义呢?在修辞学家看来,话语是对某一特定修辞情境的适切反映。修辞情境最重要的内涵是修辞急

缺,即为修辞者感知,急需且能够通过话语手段干预的某一紧急事态。修辞者甚至可以通过话语手段人为制造急缺,从而为其主动干预提供借口。这意味着急缺本身也可以成为修辞发明的手段。批评话语分析将受众权力模型简化实质上就是其创造的学术修辞急缺,为其理论的提出创造了又一个“师出有名”的“修辞情境”。

五 结语

批评话语分析与修辞的联系或其修辞转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兴趣与修辞的传统关注一样,也是将话语当成一种人类行动和对历史与文化的建构力量,因而必然具有伦理与意识形态维度。与修辞批评相类似,批评话语分析解构被客观化的现实,强调话语权力的施为作用,认为语言的运用已然充盈着政治、社会等权力的因子,语言现象或话语实践必然体现着社会和意识形态关系。二是批评话语分析本身作为一种学科话语实践也充满了修辞运作。从修辞的角度对“批评话语分析”这一独特话语的解析反思,不仅是批评的应有之义和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特殊案例研究,而且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学术话语运作机制的认识,揭示其修辞的本质。

批评话语分析的修辞性也表明,作为一种学术话语或研究范式,批评话语分析完全可以理解为在语言学科内,通过征用语言学理论,使批评过程更加精确、细致,因而看起来更加严谨、“科学”,以顺应、符合语言学科场域“科学性”的机构逻辑的修辞批评,或者说是修辞批评在语言学场域的顺应性变体。Bakhtin 曾指出,语言的修辞性并未受到充分重视,(语言学家)一旦对修辞话语的各种鲜活的形态加以研究,就必然会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产生极其革命性的影响^{[22] [P268-269]}。与修辞批评同延异构的批评话语分析也可以理解为当代语言学家们对 Bakhtin 的修辞箴言的积极回应。批评话语分析在学术界的广泛接受表明其生成和崛起过程完全符合学术场域的话语逻辑。这也证明修辞在学术创造、知识生产和思想传播中的合法性和不可或缺性。

参考文献:

- [1]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2] Wodak R. What CDA Is about [G]//Wodak R, Meyer M, Ed.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 Publications Ltd. 2001.
- [3] Blommaert J.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4] Chouliarake L, Fairclough N.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 [5] Rufo K. *Rhetoric & Power: Rethinking & Relinking* [J]. *Argumentation & Advocacy* 2003 40.
- [6] McKerrow R. *Critical Rhetoric: Theory & Praxis* [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989 56.
- [7] McGee M. The “Ideograph”: A Link between Rhetoric & Ideology [J].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980 66.
- [8] Burke K.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9] Nelson J, et al.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Language & Argument in Scholarship & Public Affairs* [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 [10] 张瑜. 西方哲学与修辞学的历史渊源及学术走向 [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5).
- [11] Perelman Ch, Tyteca O.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 [M].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9.
- [12] Simons H. *The Rhetorical Turn: Invention & Persuasion in the Conduct of Inquir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13] Bazerman Ch. *Genre & Identity* [G]//Coe R, et al, Ed. *The Rhetoric & Ideology of Genre*. NJ: Hampton Press 2002.
- [14] 刘亚猛. 追求象征的力量: 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 [15] Tracy K. *Discourse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K]//Schiffrin D, et al, Ed.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UK: Wiley - Blackwell 2001.
- [16] 张意. 文化与符号权力: 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17] Billig 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Rhetoric of Critique* [G]//Weiss G, Wodak R, Ed. *CDA: Theory & Interdisciplinarity*.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18] Fairclough N. *Language & Power* [M]. London: Longman Group 1989.
- [19] Aristotle. *On Rhetoric* [M]. Kennedy G, Trans. NY: Oxford UP 2007.
- [20] Widdowson H. *Text, Context, Pretext: Critical Issues in Discourse Analysis* [M].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 [21] Hall S. *Encoding/Decoding* [G]//Hall S, et al,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Unwin Hyman 1980.
- [22] Bakhtin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A Critiqu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of Inquiry”

TU Jia - jin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Rhetoric of inquiry” maintains that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academic practice are themselves rhetorical and discursive practices hence necessarily bound by historical and contingent factors and saturated with persuasion and power. Like thi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an itself be taken as both a discourse and a rhetorical practice and thus it can be critically anatom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of inquiry” to uncover the modus operandi of its successful rise as a research paradigm. It is revealed tha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mbodies the rhetorical turn in which it is also committed to the theoretical interests upheld by rhetorical studies and its academic success is the result of rhetorical inventions fully sanctioned by the logic of the academia. This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indispensa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rhetoric and argumentation in academic crea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ideas.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rhetoric of inquiry”; argumentation; academic discourse; rhetorical invention

(责任编辑 胡海金)